

廖平《知圣篇》考辨

黄 开 国

前贤纵论近代经学，多盛推廖平。廖平以经学六变闻名于世，研究其著作，常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，就是廖平的不少著作，原本是作为某一变的书而写成，但今存的版本却掺杂了很多的后来的思想内容。要将这类著作严格地作为某一变的思想来研究，首先就得确定原作的内容，排除其后来掺杂的东西，这就需要考辨其书的流变。

在这类著作中，《知圣篇》最具代表性。它是廖平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，康有为曾据以著成《孔子改制考》。因而，研究廖平的学人多论及此书，但多忽略了今存《知圣篇》与原本间的差异，而造成某些不该有的理论混乱。故有特别加以考辨的必要。

1886年，廖平著作了经学第一变的代表作《今古学考》。这部书提出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区分的根本在礼制的观点，解决了经学史上两千年来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。该书在平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时，提出古文经学主周公，今文经学宗孔子之说。但是，廖平不久就感到，此说有周、孔并重，一林两虎之嫌，他又遍考先秦西汉文献，发现所谓古文经学，不过是刘歆作伪的产物。自先秦至西汉哀平之间，只有今文经学。而今文经学皆祖孔子，并无周公一说。所谓周公一说，乃是刘歆作伪时用以与孔子相抗敌的伪造。廖平认为，刘歆作伪的最大恶果，就在于掩蔽了素王改制说这一经学微言大义。由是廖平著作了以阐明素王改制说为核心的《知圣篇》。

所谓素王改制说，原是汉代今文经学公羊学的可骇异义。此说孔子为受命于天的圣人，有帝王之德，但无天子之位，故称素王；孔子著《六经》是代天立法改制，是为素王改制。汉代公羊学造作此说，为的是论证孔子为汉制法，附会《六经》是孔子替刘氏王朝所立的法典。廖平的《知圣篇》认为，公羊学素王改制说是经学的全部要义所在。但公羊学的素王改制说只讲孔子为汉制法，远未穷尽素王改制的义蕴。在《知圣篇》看来，孔子改制著《六经》，非但是为汉立法，亦是为唐立制，为宋立法，为整个中国立万世法，“集群圣之大成，垂古今之定制”。这表明，《知圣篇》所要阐明的所谓“知圣”理论，在本质上不过是公羊学的素王改制说的发挥。

《知圣篇》著成于1888年。当时，廖平的恩师、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正筹编一套《国朝十三经疏》，因特重廖平在经学上的深厚造诣，是以将编纂《左传》的巨任相托。第二年，廖平在京参加礼部试后，应张之洞之邀，由京城经天津、苏州等到达广州。廖平会见恩师，每有新著都会带上请教，这次就携有《知圣篇》等新作；同时，他也想仰仗恩师之力，打算在羊城出版这部著作。可是，张之洞治学以汉学为宗，推崇东汉古文经学和乾嘉朴学，

廖平的《知圣篇》却讲今文经学，与其师的学术指归异趣，因此，他的著作不仅没有被刊行，反而受到张之洞的批评。然而，这部书稿却被人们转相抄录，轰动羊城。廖平为之作序的《井研县志》提要其书说：“平客广州，欲刊此本，或以发难为嫌，东南士大夫转相抄录，视为枕中鸿宝。”1890年春，康有为会晤廖平所见到的就是这个稿本，并据以著成了《孔子改制考》。

但是，这个稿本却因借抄者太多而佚失了。廖平在1901年5月15日，改定《知圣篇》时所写的《自跋》说：

此册作于戊子（1888），盖集同学课艺而成。在广雅时传钞颇多。壬辰（1892）以后，续有修改。借钞者众，忽失不可得。庚子（1900），于射洪得杨绚卿茂才己丑（1889）从广雅钞本，略加修改，以付梓人。此册流传不一，先后见解亦有出入，然终以此本为定云。

廖平客居羊城，住在广雅书院，故《知圣篇》抄本多由广雅而出。1899至1901年间，廖平任射洪县教谕，从而有机会得见该县杨秀才的广雅抄本。《知圣篇》的定本，就是依杨氏抄本而改定的。

钱穆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》中曾说：“今刻《知圣篇》，非廖氏原书，原书稿本，今藏康家，则颇多孔子改制之说，顾颉刚亲见之。”顾颉刚先生对此说未有异议。据此似廖平《知圣篇》的原稿落于康有为之手。但廖平多次道及他与康有为的关系，都无《知圣篇》原稿落于羊城或康有为之手的说法。他的《自跋》明言，原稿的失落是1892年以后的事。因此钱穆之说似又不可全信，顾颉刚先生所看到的，很可能是一个抄本。在廖平原稿不存的情况下，康家的这个钞本就是最能反映《知圣篇》原本风貌的本子了，但这个钞本今天亦无从见到了。

今存只是廖平称之为定本的《知圣篇》，它的底本是据原稿抄写的广雅抄本，尽管传抄难免有遗误，但一般地讲与原稿不会相去太远，而且，经过作者本人的亲自修定，遗漏与错误都可以得到补充和纠正。因此，定本与原稿之间不会有多大差异，理应说得过去。但二者实际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，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。

一是政治变动的原因。1898年，戊戌变法的失败，康有为被慈禧太后的清廷目为叛逆头目，其思想受到封建势力甚嚣尘上的攻讦，而他的孔子改制说更成了被集中攻击的目标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源出《知圣篇》，为当时天下人所共知，封建时代株连成风，廖平也因此被列入清廷的黑名单，由成都尊经书院贬放到僻远的射洪县任教谕，并被视为变法维新的始作俑者，与康有为一起受到攻讦。乃至1914年，叶德辉还在《经学通诂》中说：“廖平、康有为虚诞陋儒，托经术以祸天下，此乃亡国之妖孽。”数次将廖、康并论，予以攻毁。

在戊戌变法失败前，廖平还斤斤于康有为的“两考”问世名震天下，却矢口不言渊源所自出，而一再道言，康有为的“两考”源出他的“两篇”，并希望康有为能与他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。但在改变了的形势下，廖平为了躲避株连的祸害，同时，“两考”所产生的社会后果，也决非廖平著作“两篇”的初衷，因此，他改而一再道言著作《知圣篇》的苦心，及其与康有为的根本区别。廖平授意他儿子师慎所撰《家学树坊》，就专列《〈知圣篇〉读法》，其中一再申言：

乃有用其义著书立说，至形之奏献，或以焚抗归，替孙卿，今议刊此篇，既曰自明，更以辟谬。或以某等传四益（按：廖平自号）之学，其有无不足辨，……某等著书甚多，无一语齿及，则足

见非私淑。

自蔡等托之《公羊》，以为变法宗旨，天下群起而攻《公羊》，直若《公羊》故立此非常可骇之论，为教人叛逆专书，遂云凡治《公羊》皆非端人正士。呜呼！何以解于葑江都？

这些说法虽与当时的政治压力有关，但却较为真实地表明了廖书与康书的本质区别。这一区别，廖平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，然而，却是客观存在的。

为了自明其与康有为的根本区别，廖平必然对杨氏抄本进行某种修改。康有为《孔子改制考》最受攻击的就是孔子改制说，廖平的修改必然重在原有孔子改制说的改写。顾颉刚先生所见到的康家藏本多孔子改制说，而今存《知圣篇》只在第24、25段有“素王改制”、“改制”的明言，其他地方则多以“孔子制作”来表示其意，这或许就是削改的痕迹。因有此改动，从今存《知圣篇》中，就难以完全知其原稿的情况，而只能做某种相对的了解。

二是廖平自身思想变化的原因。廖平治学以善变闻名，他主张学贵变通，三年一小变，十年一大变。自1886年提出平分今古的经学第一变，一生学经六变。而《知圣篇》只是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之一，从其书的著作到刊行问世，又有17年的时间。这期间，廖平于1897年开始经学第三变，1902年又进入经学第四变。他1901年写的《自跋》虽称“以此本为定”，实际上直至1904年刊行问世，廖平一直对其有所修补。因此，今存《知圣篇》不惟有经学第二变的思想，而且混杂有经学第三、四变的内容。要准确地排除其中经学第三、四变的内容，需得粗略地了解一下经学第二变与第三、四变的内容。

廖平的经学第二变名尊今抑古，即尊崇今文经学，贬抑古文经学之意。其代表著作有两部，据廖平自己说，《辟刘篇》为抑古而作，《知圣篇》为尊今而著。其实，《知圣篇》的主旨是讲“知圣”，核心是讲孔子改制为中国立万世法。廖平要“辟刘”，也是因刘歆作伪，造成古文经学孤行千余年，掩蔽了“知圣”的经学微言。因此，《辟刘篇》不过是为《知圣篇》作论证的，廖平经学第二变的中心是《知圣篇》所阐明的所谓“知圣”的经学微言。

继之的经学第三变名小统大统。小统亦称王伯、小康，大统亦称皇帝、大同。这一变认为，经学第二变所发明的孔子为中国立万世法，只是孔经的小统说，适用地域方三千里的小九州的中国，为世界开通以前小康时代的法典，经传称之为王伯，以《春秋》为经，《王制》为传；孔经还有更高层次的大统说，适用地域方三万里的大九州的全世界，是全球开通以后大同时代的法典，经传称之为皇帝，以《尚书》为经，《周礼》为传。经学第四变名入学天学认为经学第三变讲的小统大统，不过是孔经中的入学，只适用于六合以内的人类社会，孔经中还有更精深的天学，适合六合以外的星辰、灵魂、仙佛世界，讲神游、形游六合以外，以《诗》、《易》为经典。很清楚，经学第三、四变不过是经学第二变“知圣”理论的发挥，但又依发挥程度的不同而有所明显的区别，如果说经学第二变的“知圣”只是在中国范围内对孔子与孔经的神化，那么，经学第三、四变则把这种神化分别扩大了全球和宇宙。

根据经学第二变与第三、四变的内容特点，可以发现今存《知圣篇》有不少经学第三、四变的内容。这有两类情况，一类是全属经学第三、四变内容的段落，包括第6、7、9、16、20、26、29、33、34、42、44、45、46、48、49、52、62、67、68、69、70诸段；一类是经学第二、三、四变内容相杂的段落，包括2、3、13、24、39、55、59、63诸段。在将《知圣篇》作为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来研究时，凡属第一类情况的段落皆在全部排除之列，属于第二类情况的段落则应排除其中经学第三、四变的内容。